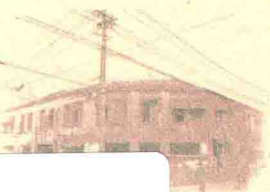




02



丽菲 主编

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 编

社  
HOUSE

# 日军「慰安妇」问题 调查与研究

# 日军『慰安妇』问题 调查与研究

02

苏智良 刘萍 陈丽菲 主编

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 编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日本侵华战争‘慰安妇’资料的整理与研究”  
(13&ZD094)成果

国家社科基金抗日战争研究专项工程项目“慰安妇”问题研究  
(16KZD007)成果

上海市高校高峰高原学科建设计划资助  
(上海师范大学中国史学科)成果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委托抗日战争史课题  
(2019WZX001)成果

南京大屠杀史与国际和平研究院规划项目成果

# 日军在湖北实施“慰安妇”制度的考察

苏智良(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武汉是华中地区的枢纽。1938年底,日军占领武汉后,在此囤积重兵,日本兵随意搜查路上的行人,劫夺行人钱财。至于日军强奸妇女之事,也经常发生。<sup>1</sup>不久,这里成为日军慰安所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除了西部高山地带外,湖北的平原地区几乎都被日军占领。日军在武汉三镇、荆门、新堤、峰口、新洲、鄂城、葛店、孝感、当阳、应山、嘉鱼、赤壁、沙洋、随州、浙河、通城等县市设立了大量慰安所。本文依据战时档案文献、日本老兵回忆、战犯供状、实地田野调查,对日军在湖北境内建立的慰安所系统进行初步的研究,以揭示历史真相,推动该领域的调查与研究。

## 一、武汉的日军慰安所

1938年秋,当武汉会战还在进行时,日本外交部门与军方已在合谋设立武汉慰安所的事宜了。9月28日,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后藤味在致外务大臣宇垣一成的《对于汉口占领后邦人进出的应急处理要纲》中已

---

1 《西报通讯员调查汉口之形形色色 民不聊生外侨大受影响 压迫摧残日人为所欲为》,《申报》1939年1月1日,第16版。

提出:“居留民以外的人来汉口,将根据输送能力和申请人的开业情况来考虑,但建立军队慰安所没有限制”<sup>1</sup>。因此第一批慰安所几乎是与日军一起进入武汉的。10月25日,日军占领武汉,在不久的该市人口统计中,标识为艺妓、娼妇的“慰安妇”已达492人。<sup>2</sup> 1939年2月3日,日本驻汉口总领事花轮义敬在致外务大臣有田八郎的《关于管理去汉口渡航者的文件》中称:“军队慰安所已有20家(包括兵站、宪兵队和本馆批准的慰安所)”。<sup>3</sup> 日本“慰安妇”均有身份证明。<sup>4</sup> 当时的中国报纸指出,“敌军到了武汉,边将‘随营娼妓’集合起来,指定区域居住,名为所谓‘陆军公娼区’、‘海军公娼区’,如老联保里、新联保里、生成里,以及特一区已烧去二分之一的六合里,现在都是公娼区。敌军在汉抢掠的我国女同胞,奸淫以后便送到公娼区里去卖笑,在这些淫窝中和那些魔窟中一样,是充满了黑暗、惨痛和残酷的景象。”<sup>5</sup> 最初的“慰安妇”来自日本大阪的松岛、飞田及神户的福原、广岛等地的妓院。武汉地区的慰安所一直开至日军战败,前后历时7年。

1938年11月3日,第2军司令官东久迩宫的部队负责对汉口和汉阳的警卫,该军立即推行慰安所制度。于是在各方的紧密合作下,慰安所很快发展起来。12月10日,第2军司令部在机密的《第二军状况概要》中记载:为了发挥皇军本来的面目,军人除前往慰安所之外,其他目的之外出一律不准。进入慰安所须购买慰安券这一制度已从11月25

1 [日]吉见义明编:《從軍慰安婦資料集》,大月书店1992年版,第116页。

2 [日]吉见义明编:《從軍慰安婦資料集》,大月书店1992年版,第193—194页。

3 [日]川田文子:《皇军慰安所の女たち》,筑摩书房1993年版,第222页。

4 [日]山田清吉:《武漢兵站》,图书出版社1978年版,第93页。

5 转引自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编:《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79页。

日开始实施。<sup>1</sup> 也就是说,该军很可能在11月就设立了慰安所。时第2军官兵达134000人,为了“发挥皇军的本来面目”而设立的慰安所,究竟有多少呢?也就是武汉的日军慰安所究竟有多少呢?恐怕很难还原历史原貌,这里拟从汉口、武昌、汉阳三地来叙述武汉慰安所的空间分布。

**汉口** 据日军高炮第22联队炮友会老兵的回忆,在汉口他们去过不少慰安所,里面有的是日本“慰安妇”,有的是朝鲜人,有的是中国妇女。<sup>2</sup>

1991年73岁的小山三男,1939年3月起应征入伍;在汉口时,他也曾去过两个慰安所。他回忆慰安所规模颇大,里面的“慰安妇”估计有100人左右。有个“慰安妇”还流着泪对他说:我们是作为特殊的护士而被征募到战场来的,想不到竟让我们干这个。<sup>3</sup>

汉口的老联保里、新联保里、生成里均有日军慰安所。生成里被称为花楼街,因为这条街上的许多楼房雕梁画栋,是民国时期汉口的繁华地。有个慰安所在汉口的长江下游地区,有5个“慰安妇”,都是日本人。<sup>4</sup>

冈村宁次时任第11军司令官,他也承认,在进攻武汉的部队中,几乎都有“慰安妇团”随行,像第6师团,尽管有“慰安妇团”同行,仍发生了强奸案。1938年11月30日,根据汉口日本领事馆的调查,仅汉口一地就有日本“慰安妇”150人。<sup>5</sup> 实际的情况当然不止这些。1940年,汉

1 [日]吉见义明编:《從軍慰安婦資料集》,大月书店1992年版,第213页。

2 参见[日]高炮22战友会:《高炮22戰史》,1971年私家版。

3 [日]《毎日新聞》,1991年12月27日。

4 参见[日]小平哲二:《戰線隨筆》,1973年私家版。

5 [日]吉见义明编:《從軍慰安婦資料集》,大月书店1992年版,第263页。

口的“娼妓”登记人员为二百数十人,实际上有二三千人。其中多是“慰安妇”。

在汉口中山路的“石子铺的路上,中国人来来往往,纷杂中有一盲妇领着一个幼儿,发出可怜的乞求声在乞讨。载着姑娘的洋车飞驰而过,里面的路边设有一家又一家的将校俱乐部(慰安所)”,“汉口闹市的后面,有二十余家慰安所,形成一条花街,士兵们都聚集在这儿。房子的墙上涂有白颜色,宪兵们控制着出入口。”<sup>1</sup>这条“花街”恐怕就是积庆里了。

积庆里原名同善里,战前是中国人居住的街弄,由1条主巷道和8条横巷交错而成,共有16幢68套二层建筑的房屋,面积约13000平方米。房屋全部是砖墙相围,5个街弄出入口都有铁门,由日军士兵站岗。

根据武汉兵站司令部的慰安妇系长(股长)山田清吉的记载,日军认为,积庆里的规模和地理位置,作为特殊慰安所相当理想,于是兵站司令部便在此建立了一批慰安所。慰安所属于第11军,由汉口兵站负责,兵站设在江汉路左侧第18码头,首任兵站司令为池田龙大佐;兵站主要干事有藤井源治中佐副官和高桥慰安系长,此二人创建并完善了积庆里的慰安所。他们接收积庆里的68户住房,首先建立了12家慰安所,其密集程度为日军占领区所少见。幸存者河大娘回忆,入口靠左的是澡堂,入口右面的是诊疗所。积庆里有2家慰安所里面是日本“慰安妇”(实际情况日本“慰安妇”的慰安所不止2家——笔者注)。战后有很多日本老兵回忆曾在那里玩乐过。其他均是朝鲜人的慰安所,接待的士兵就更多了。

1 [日]佐佐木元胜:《统野战邮便旗》,现代史出版会1973年版,第212页。

到1938年11月底,积庆里慰安所已增加到30家,有日本“慰安妇”130名,朝鲜“慰安妇”150名,共280名。其利用规则是士兵30分钟2日元,下士官1.5日元;将校和军队聘用人员1个小时3日元,并且将校可以住宿,价格是10日元。<sup>1</sup> 1943年4月后,如支付储备券时,100元储备券相当于日币18元,当时,进入慰安所的价格是士兵储备券30元、下士官50元、将校100元。这一年,积庆里有日本人经营的大阪清南楼(大阪)、东成楼(神户)、羽田别庄(广岛)、清富士楼、战捷楼、松本楼、胜已楼、松浦楼、杉本楼等9家慰安所;朝鲜人经营的慰安所11家,如三好楼、青山馆、三成楼、泰平馆、平和馆、花乃屋、武汉楼等。其中的“大和馆”慰安所是积庆里24号,老板是来自广岛的二鹿静香,电话为21870。

一个日本九州出身的女人与中国人结了婚,日军占领武汉后,她便与日军兵站联络,在积庆里1号开设了慰安所。性奴隶有14到15人,多是中国贫困地区的姑娘。由于中国妇女的生活习惯不同,语言不通,日军更担心泄露军事机密。因此,约一个多月后,经营者决定将中国性奴隶清理退出,但并没有给她们自由,而是把她们带到六合里去继续充当日军“慰安妇”。<sup>2</sup>

日军的兵站司令部专门设立慰安系(股),由将校2人、下士官2人、士兵4人共8人组成。其职责是管理“慰安妇”、监督慰安所运营,如积庆里慰安所的入口,有日本兵的步哨日夜守卫。此外慰安系还负责食堂、酒家、演剧、放电影、迎送慰问团等事情。积庆里设有日本陆军汉口特殊诊疗所,给“慰安妇”治疗性病,负责人是中尉长泽健一军医,后为

1 [日]长泽健一:《汉口慰安所》,图书出版社1992年版,第54页;山田清吉:《武汉兵站》,图书出版社1978年版,第77页。

2 [日]山田清吉:《武汉兵站》,图书出版社1978年版,第87—94页。

宫崎菊雄和大泽义夫。各慰安所每日接待日军的人数、金额等,须每天向慰安所报告。在积庆里,曾建有一座病故“慰安妇”供养塔,说明当年有不少“慰安妇”死在这里。直到现在,做晨操的“中国大妈”们对此塔还有记忆。抗战胜利后供养塔被拆除。<sup>1</sup>

进入积庆里,两边排列着“某某楼”、“某某馆”的广告。慰安所墙上贴着女性的照片,“慰安妇”的房间在2楼。根据日本官兵的评价,积庆里与日本内地的游廓吉原颇为相同。这里的女子多是本州等日本南方出身的人,还有很多是半岛人(朝鲜人)。这里晚上是军官专用的。<sup>2</sup>

积庆里慰安所一直到日军战败才结束。当时在武汉周围地区的朝鲜人“慰安妇”共2100人。日本战败投降后,慰安所人员被集中到中山路北与江汉路西的日军司令部军用宿舍,随后用船运到上海遣送回国;实际上有不少朝鲜人留在了武汉,河大娘就是其中的一位。

积庆里的房屋在战后有所改造。受害者河大娘对积庆里所有的一切都非常痛恨,从心底里厌恶。1998年当我提出请大娘引路去寻访积庆里慰安所遗址时,河大娘非常坚决地拒绝了,她说:“这辈子我再也不想去了,积庆里22号,你自己去吧!”<sup>3</sup>与她有着相同经历的朝鲜女子留在武汉的,至少有40位。

除了像积庆里这样军队慰安所外,日军部队也会开设只属于自己部队的慰安所。如第11师团天谷支队为开设本部的慰安所,便从日本内地募集来50名日本“慰安妇”,并向汉口日本领事馆提出了“渡航”的

1 《日军曾在汉口积庆里开慰安所沦陷期慰安妇280名》,《长江日报》2014年2月26日。长泽健一的《汉口慰安所》中刊有供养塔的照片。

2 [日]村上千之助:《野戦預備病院:ある卫生兵の私記》,1992年私家版,第62页。

3 苏智良采访河大娘记录,1998年。战后原籍韩国的河大娘一直生活在武汉;如今,87岁的河大娘仍在汉口居住。

申请。遇到这样的情况，汉口总领事要照会日军驻武汉的最高机关。这也表明，建立慰安所军方高层不仅知晓，还要获得他们的批准。

东山里在繁华地中山大道的旁边，战时这里也有日军慰安所，里弄口有日本兵站岗，弄内的两侧都是慰安所。有汉口本地人回忆，常看到涂着口红、穿着和服的 20 岁左右的“慰安妇”，表情忧郁，情绪低落。在东山里的周围，到处是慰安所扔出来的使用过的安全套，天真的小孩常常拾起来当气球吹。房间的窗户上有坚固的铁栏杆，“慰安妇”是无法爬出逃跑的。

在日租界的沿江地带还有属于日本海军的慰安所，时称俱乐部。海军军舰靠岸后，官兵们立即可入俱乐部放纵。俱乐部不仅有“慰安妇”，还有高尔夫、台球和酒吧等设施。这里的“慰安妇”与别处不同的是，都穿着西装。

日本租界汉中街（现为胜利路）慰安所的房子是红瓦连排的房屋，现在的门牌是 140 号，规模颇大，有日本、朝鲜和台湾的“慰安妇”，具体数字不详，它属于日本海军，从 1938 年起一直开到战争结束。门口有士兵站岗，两小时轮换一次。窗上也有铁格子，“慰安妇”无法逃跑。

六合里地处日租界，当时已被日军炮火毁去一半。日军占领汉口后不久，木村少佐即命中川中尉和森本军曹等，选定开设慰安所的房屋，其中有民权路的住宅地。1939 年春，兵站负责调配房屋的家屋股根据日本侨民的申请，批准六合里慰安所营业。于是这里出现了四五家慰安所，里面都是 20 岁左右的中国女子，她们是避难区和华人地界诱骗来的贫困少女，其中有的已是母亲，也有些是被卖到这里来的女孩。老板逼她们接待日军官兵，士兵到达前，老板就让她们在一层的厅里集中，由士兵来挑选。六合里的慰安所费用比积庆里低廉，是由当地日本

领事馆管理的。<sup>1</sup> 后来日本总领事馆警察署经过调研,提出慰安所有些业务要向军队移交,如性病检查多由现地部队的军医担任,通常是一周检查一次。

山田清吉回忆,因担负防疫巡查公务,曾到六合里来过。在某个慰安所,曾遇见一个十六七岁的姑娘,非常可爱。老板说,她的父母是被日军炸死的,无法生活才流落到此。听说,慰安所的老板们对应找怎样的女子做“慰安妇”非常精通。一般在挑选中国“慰安妇”时,会用手伸入对方的阴部,然后闻一闻气味,一边说“很臭”“很臭”,一边说“合格”了。原来他们只要稍微嗅一下阴部的分泌物便知道这个女子有否性病了。<sup>2</sup>

除了明确的慰安所以外,还有当地妓业主设立的供日军官兵行乐的妓院,这通常是秉承了日军旨意的汉奸政权下令开设的。其名称有同怀、文明、新新、侠洲、武汉、陈公和、维新、龄鹤等,里面的女性有周菊英、王金花、陈寿弟等数十人。如秦晋荣设立的武汉旅馆内,多为十五六岁的少女,秦经常向日军士兵做宣传:“我们这里弄来的全是些年轻水灵的。”<sup>3</sup>

在东京,保存着一份日军第一医院对汉口“慰安妇”体检统计的“机密”文件。该文件称,从1940年4月29日到11月30日,共计有2278人次的“慰安妇”进行健康诊断,其中有55人次“入院治疗”。<sup>4</sup>

**武昌** 根据汉口日本领事馆的调查,1938年11月时武昌的“慰安

1 [日] 村上千之助:《野戦預備病院:ある衛生兵の私記》,1992年私家版,第62页。

2 [日] 山田清吉:《武漢兵站》,图书出版社1978年版,第92页。

3 [日] 千田夏光:《從軍慰安婦》,双叶社1973年版,第98—103页。

4 [日] 吉见义明编:《從軍慰安婦資料集》,大月书店1992年版,第248—252页。

妇”有 245 人<sup>1</sup>，比汉口的“慰安妇”还多 95 人。蛇山脚下是日军慰安所的另一个集中地。原军医长泽健一指出，在蛇山公园的脚下向右侧往蛇山的方向去的大路两边有 20 家以上的慰安所，慰安所大门口有士兵站岗。经营者多为日本人，“慰安妇”则是日本人和朝鲜人，共 200 人左右。后来是大桥浴池旅社的地方，就是当时供日军和“慰安妇”洗澡的澡堂，至晚在 1942 年就已开设了。

武昌的斗级营可以说是武昌慰安所又一个集中地。《支那在留邦人人名录》记载着斗级营大盛馆、梅崎楼、大和馆和菊水等 4 家慰安所的概况：

表 1 武昌斗级营的部分慰安所

| 名 称 | 性 质 | 经营者  | 经营者出身地 | 地 址      |
|-----|-----|------|--------|----------|
| 大盛馆 | 慰安所 | 金炳鲁  | 朝鲜平安道  | 斗级营 47 号 |
| 梅崎楼 | 慰安所 | 梅崎早苗 | 日本福冈县  | 斗级营 18 号 |
| 大和馆 | 慰安所 | 黄河顺  | 朝鲜平南道  | 斗级营 96 号 |
| 菊水  | 慰安所 | 野口文伸 | 日本熊本县  | 斗级营 80 号 |

资料来源：《支那在留邦人人名录》，第 33 版，上海金风社 1942 年版。

日军武昌军用邮局局长佐佐木元胜回忆，1938 年 11 月，这个梅崎楼为二层建筑，是日军兵站在武昌开设的 6 个慰安所中的一个。到了傍晚，日海军船上船员鱼贯而入。里面有 11 名女子，单人床之间用木板隔开。他曾看到日本兵在走廊前叽叽喳喳地等待着。当我们一起从慰安所回来时，曹长不太愉快地高声道，船员们太傲慢了。<sup>2</sup> 斗级营的

1 [日]吉见义明编：《従軍慰安婦資料集》，大月书店 1992 年版，第 263 页。

2 [日]佐佐木元胜：《续野战郵便旗》，现代史出版会 1973 年版，第 149 页。

“慰安妇”既有日本人、朝鲜人,也有中国人。日军逼迫大批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每逢星期天,日军“成群结队来此发泄兽欲。”<sup>1</sup>有个士兵在战后回忆,1938年11月“弓指君领着我参观慰安所,转了二三处,都是大满员的状态,心急如焚的士兵们排着队,轮到的人脸上露出笑容。”<sup>2</sup>朝鲜妇女朴娥姬现名毛银梅,她回忆当年的受难之地便是在武昌,且离黄鹤楼不远,很有可能便是在斗级营。<sup>3</sup>

现在武汉大学教师的老住宅,有的曾被日军建立慰安所。一位日本老兵回忆,1938—1943年他担任卫生兵,负责伤病员的输送。当时武汉大学的师生已逃难离去,日军便将大学改成了陆军医院,在教室里设有100~200张病床,武汉地区的伤病员士兵集中于此,也有因患性病而入院的士兵。老兵回忆,占领武汉仅半年即1939年春,就在陆军医院周围的武汉大学教师宿舍设立了慰安所。至少有3到4家,其中有一家朝鲜人“慰安妇”,每个房间里有一名20来岁的朝鲜“慰安妇”<sup>4</sup>。士兵们去慰安所多是星期日,准备去的人须在两三日日前在部队本部领取慰安券,形状好像日元10钱左右的纸币。每个士兵的利用时间只有5~10分钟,星期天一直有20个士兵排着队,等待进入“慰安妇”的房间。<sup>5</sup>笔者查到1942年出版的《支那在留邦人人名录》第33版,内载珞珈山的395号设有“松之屋”慰安所,经营者是朝鲜京畿道来的郑德善。

1 武汉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武汉文史资料》,第32辑,武汉市政协1988年印,第88页。

2 参见[日]浜崎富藏:《满身是泥的士兵》,1970年私家版。

3 苏智良、陈丽菲2000、2003、2006年采访毛银梅老人记录;目前老人已91岁,生活在湖北孝感。

4 [日]山田盟子:《従軍慰安婦》,光人社1995年版,113页。

5 [日]“従軍慰安婦110番”编辑委员会编:《従軍慰安婦110番》,明石书店1992年版,第64页。

佐佐木元胜也曾记载,在武汉大学的山坡上,有红色瓦片屋顶的西洋式建筑,里面有二三家慰安所,女性多是从难民区来的,日本兵晚上睡在慰安所的蛮多的。<sup>1</sup>

武昌有个名叫“世界馆”的慰安所,是在一幢 3 层的砖房里。宋神道从朝鲜新义州被诱骗到武昌是 1938 年,只有 16 岁。宋神道看到慰安所的墙壁上还有血迹,附近甚至还有女性尸体而没有人去收拾。当宋神道被拉到检查台上进行妇科检查时,她感到极其耻辱。士兵进入她的房间时,她只能在角落里哭泣。那个士兵见她这样,有些无奈,也不能立即动手。老板见状立即对宋神道拳打脚踢,还训斥道:为何不接待?最后,宋神道还是成为遭受日军蹂躏的性工具。从早晨 7 时到下午 5 时接待士兵,下午 5 时以后到深夜 12 时接待军官,而且没有分文报酬,这真是性奴隶的遭遇。<sup>2</sup>

武昌的慰安所并不少见,在今二马路平和里也有两处慰安所遗址。新八千代慰安所为日本人青木ユキア经营,地址在西宫街 7 号。武昌司门区甚至还有与积庆里类似的特殊慰安所街。一名日本老兵回忆,所属部队 1944 年在武昌附近的纸坊镇驻扎,他印象中的慰安所“都是土坯子盖的脏破房子,门口遮着苇席、草帘子。尽管觉得脏,可还是有很多士兵一边自嘲着:‘去公共厕所’,一边仍去光顾。”<sup>3</sup>滋贺县大津市的一名 79 岁(1992 年)的男性,曾是原日军第 16 师团岚部队的士兵,1944 年到 1945 年期间驻屯武昌,他看见慰安所里“有朝鲜人慰安妇 50

1 [日] 佐佐木元胜:《続野战郵便旗》,现代史出版会 1973 年版,第 292 页。

2 [日] 菅原幸助:《初年兵と従軍慰安婦》,三一书房 1997 年版,第 202 页。

3 [日] 星野博:《衡阳最前线》,从文社 1986 年版。

多人。”<sup>1</sup>

汉阳地区的慰安所尚需进一步研究。有一韩国受害者回忆曾在武汉的一个慰安所,但尚不能确认是否在汉阳:

慰安所设在一个原中国人的民居里,离日军驻地仅 10 多米远。里面共有 20 多个“慰安妇”,有妃贞子、朝子、澄子、正子、时子、梅子等,年龄最小的仅 14 岁。还有两个日本女人。

慰安所住的是木板拼成的床,“慰安妇”所吃的饭也是军队送过来的。军人来慰安所时,自己带着避孕套等,但“慰安妇”们自己也准备着。

慰安所规定,从上午 9 时到下午 5 时,接待士兵;下午 5 时到晚上 8 时,接待下士官;从晚上 10 时到 12 时,接待高级军官。军官也可以在慰安所里过夜。士兵的入场券为 2 元钱。每次军人入内,先给坐在慰安所入口处的金山付钱,然后拿着自己选中的“慰安妇”的房票进入房间。“慰安妇”每个星期做一次性病检查,每次检查都是在部队医院进行。<sup>2</sup>

总之,武汉是日军推行性奴隶制度的重灾区,慰安所是非常密集的。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经调查确定在湖北居住的有名有姓的“慰安妇”受害者就有 40 多位,其中如袁竹林老人战后住在鄱阳街,1998 年曾到多伦多控诉日军暴行,2000 年作为证人曾出席东京审判性奴隶制度民间法庭活动。<sup>3</sup>

1 [日]《统一日报》,1992 年 4 月 23 日。

2 [韩]韩国挺身队研究会编:《被掠往侵略战场的慰安妇》,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52—156 页。

3 香港女作家李碧华曾为她写作《烟花三月》,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2 年版;本人的《慰安妇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9 年版)和 *Chinese Comfort Women: Testimonies from Imperial Japan's Sexual Slaves* (丘培培、苏智良、陈丽菲著,加拿大 UBC 出版社 2013 年版,牛津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香港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记叙袁竹林老人的故事,老人于 2006 年 3 月 29 日病逝。

## 二、湖北其他地区的日军慰安所

日军占领湖北以后,在荆州、黄冈、孝感、朔州、宜昌等地设立了各种类型的慰安所。

**荆门** 第39师团长陆军中将佐佐真之助供认,该师团驻扎荆门时曾建立慰安所。<sup>1</sup> 而且“慰安妇”数量不少,该师团的官兵经常进入。“慰安妇”有中国人、朝鲜人和日本人。在荆门日军司令部的所在地,只隔着两三栋房子,就有一家慰安所,“慰安妇有朝鲜人和当地的女子共四五十人。”<sup>2</sup> “慰安妇”每天要遭受20多名日本兵的蹂躏,累得“像要死了一样”<sup>3</sup>。

广岛吴市的久保田哲二<sup>4</sup>,1941—1944年间,在湖北当兵,是第39师团步兵第231联队的下士官,曾奉命管理慰安所。1999年,我到广岛进行演讲时,曾采访了久保田哲二。时年79岁的久保田指出,“慰安妇”确实是在日军的管理下从事性接待之事。他接触过的慰安所有荆门县的李家、杂树店、江陵县的沙市、宜昌县的白雀寺,其中的李家、杂树店的慰安所完全由“警备队本部庶务股”负责,是日军直接管理的。

1 [日] 日本の戦争責任研究センター编印:《戦争責任研究》,第23辑,第26页。

2 [日] 森金千秋的《恶兵》,丛文社1978年版。

3 [日] 山田盟子:《從軍慰安婦》,光人社1995年版,第114页。

4 久保田哲二1919年3月29日出生,1939年12月1日入伍,加入广岛步兵第11联队补充队,次年3月24日,转至第39师团步兵第231联队第1机关枪中队,侵入湖北。当时为机关枪手。他参加了宜昌作战,曾进入随县、枣阳、陈家集、荆门、黄家集、姑牛岭等处。战争结束时被苏联军队俘虏,在苏联关押达6年时间,此后于1950年到中国抚顺战犯管理所关押6年,然后免于起诉而释放,1956年6月22日返回日本。后为中国归还者联络会广岛支部的成员,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他第一次见到我时,就诚恳地低头说:我是侵略过中国的老兵,我向中国人民表示道歉。我在抚顺从鬼变成了人。(苏智良2000年1月采访久保田哲二记录整理,感谢日本友人由木荣司等的协助)

久保田哲二回忆：1941年初，我从事慰安所业务时，第一次知道《关于慰安所业务的规定》，这个规定写道：“设置慰安所的目的，是缓和官兵杀伐的风气，有助于军队保持纪律和战斗意志的高昂。”“为慰安所业务的监督指导而任命警备队长”，这表明慰安所在军队直接管理下运行。还有“军队掌握业者的经营权”、“如不能履行规定将停止其营业或退出该业”等。这表明慰安所的运营完全根据“军队的命令”。

那么军队与慰安所的关系到底怎样呢？久保田哲二以他的亲身经历为例。1941年，军队上司要求在李家建立慰安所，于是他们挑选了独立的民间住房，那里四面都有其他部队驻扎，“慰安妇”既不可能逃亡，又不可能有人从外部进行袭击。李家慰安所除了“慰安妇”的房间外，还有管理人的房间、仓库、厨房、接待室、角落边有浴室和厕所。四周有高高的栅栏。慰安所的大门前，不开放时摆设着障碍物。里面共有5名“慰安妇”。分别监禁在自己的房间里，在那里过着屈辱而漫长的生活。“慰安妇”是不准到栅栏以外地方去的。我们把她们当作是性奴隶。食物、燃料、日用品等都是从警备队（大队）部的经理委员那里购买来的，经理委员利用军队非常低廉的货源和当地高物价之间的价格差别而获得大量的好处。至于为什么不准“慰安妇”外出，与其说是为了防止间谍、逃跑或被拐骗之类的，还不如说是为了不让中国社会了解慰安所的实况。“慰安妇”受害者除了痛苦，最后什么也没有了。<sup>1</sup>

1942年，日军占据荆门地区的洪湖新堤、峰口后，便设立专供日军军官淫乐的慰安所。由于战线较长，日本籍“慰安妇”无法送到前线，日

1 苏智良 2000 年 1 月采访久保田哲二记录整理。